

跨国史的兴起及其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李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089)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对肇始于19世纪的“民族—国家”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的批判和“美国史国际化运动”的推动,跨国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研究中逐渐兴起。入江昭、伊恩·蒂勒尔和托马斯·本德这些跨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进行了最初的主题和实践尝试。他们关于跨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跨国史范式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新书写;二是基于跨国史视角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和考察。跨国史对于教育史研究有诸多意义:一是让我们重新审视教育史的价值追求;二是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三是为教育史的完整书写和编撰带来了启发。我们可以运用跨国史推进教育史研究。

关键词:跨国史;“民族—国家”研究范式;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9)06-0102-06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9.06.0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跨国”的视角审视和研究历史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种潮流和趋势。这场被称作“史学编撰的革命”^[1]正在对史学观念、历史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方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试图对“跨国史”这一史学新潮流的产生背景、研究主题与研究实践做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跨国史研究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一、跨国史研究的兴起

自19世纪以来,历史编撰与书写一直秉承着一种“民族—国家”研究范式,这一历史研究范式一经确立便经由欧洲继而席卷整个世界,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研究的基础。

这种“民族—国家”史学研究范式之所以肇始于19世纪的欧洲,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一时期国家疆域的界限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苏醒。众所周知,欧洲各国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逐渐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国家疆域。代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也由此开启了近代国际关系史的新局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否定了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一统’权威,完成了欧洲的政治区域化

进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由此而为以后的西欧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民族国家成为近代西欧国际政治体系发展的主流”。^[2]另一方面,国家疆域的确使当时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更愿意将历史写作的主题限定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以19世纪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和同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巨匠兰克为例,虽然两者在历史研究方面采取的是在后代人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方法论取向,即,“前者代表着从理论或概念出发研究历史的哲学学派(或称‘史观派’),后者则代表着从史实或史料出发的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或称‘史料派’)”^[3],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主张国家乃是历史的目的,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唯有在国家的组织之中,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同时,个人只有在替国家服务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意志”^[4]。也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以哲学视角观察历史的代表人物黑格尔还是强调“如实直书”观察历史的代表人物兰克,都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这种历史编撰与书写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一方面促使历史变成了民族国家史,“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天然的、不证自明的研究单位”^[5];另一方面促成了史学的专业化和国家

收稿日期:2019-03-21

作者简介:李辉(1986—),男,山西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研究院科研助理,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政策研究。E-mail:825894474@qq.com

化。伴随着19世纪之后更多民族国家兴起,史学研究的“民族—国家”范式也随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所改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人员、资本、信息、商品、服务等要素在技术革命下加速了跨国流动和全球范围内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民族—国家”范式的史学研究逐渐为学者们所质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全球化带来的诸如通信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勃兴、人口的全球迁徙等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在他们看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了对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理解,忽略了这些发展进程背后的全球力量”^{[1]13}。基于此,他们号召以全球和跨国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

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范式的史学研究进行的重新审视和批判为跨国史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美国史国际化运动”对于跨国史的最终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谓“美国史国际化运动”,指的是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的影响,美国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打破以往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重视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于美国外交史的影响,将美国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为研究美国国家和人民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交往互动的国际史和跨国史的过程。诚然,这一运动发生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之势不无关系。同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作为主要研究近现代美国外交和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是这一运动主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1988年,在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主席之际,入江昭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历史学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的主席演说。他批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国家化”倾向,指出历史学家有必要对他们的研究“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

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视为研究的框架”^[6],将外交史转变成国际史。他的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倡议得到了外交史学者的积极响应,也使美国的外交史成为最早摒弃“民族—国家”研究范式的史学分支。但是,到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上升和移民问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等跨国事务和议题的增多,入江昭和他的同事们逐渐意识到,“单纯用民族国家或者国际史的框架,已经无法充分解释这些真正全球范围的新进展”^{[1]12}。90年代末,以入江昭、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和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历史学家结合自身历史研究的经历和实践,最终开始强调用“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代替“国际史”并付诸实践。其他国家的学者也逐渐受到这些美国历史学家的影响,纷纷开始以跨国的视角解读本国的历史。跨国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研究中逐渐兴起。

那么,何谓跨国史?它与“国际史”“全球史”又是怎样的关系?

作为跨国史的主要倡导者,入江昭认为,“跨国史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跨越国家边界的运动和力量的研究”^[7]。跨国史和国际史并不完全等同,“国际史研究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将世界事务视为国家间关系的总和……与之相反,跨国史则专注于研究跨国个体、非国家行为体和各种无法用国籍界定的共同体之间所存在的跨国纽带,并探索国家间关系以外的网络。”^{[1]18}跨国史和全球史共性显著而差异细微。“根本说来,跨国史和全球史有两个共同之处:首先,它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探索国家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其次,它们都关心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并不局限于世界上一小部分国家或者某个特定的区域,也都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并将欧美以外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之中。”^{[1]15}可见,跨国史和全球史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致力于探讨全世界所有国家而非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部分国家的问题。但是,入江昭也强调,跨国史不能完全等同于全球史,在他看来,“如果全球史试图研究的是整个人类世界,那么跨国史则试图在不同的情境(包括民族国家)中研究个体的生存境况。换句话说,跨国史并不否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在特定历史时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民族国家与跨国个体、

国家事务与跨国日程、国家利益与跨国使命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跨国史研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17-18]

国内史学界在近些年也对跨国史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探讨,刘文明对跨国史和全球史进行了比较,指出跨国史与全球史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都强调从全球、互动和关联的视角来理解历史,其差异主要体现在所适用的历史时期和“去国家化”的程度上,比起全球史,“跨国史主要探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历史现象……跨国史承认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甚至包括以全球史理念和方法来研究的民族国家史”^[8]。基于此,他认为“跨国史既是一种以近现代和当代跨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也是从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近现代和当代民族国家史的历史,是当今全球史多元实践中的一种重要表现”^[8]。王立新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跨国史、国际史、全球史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跨国史和国际史、全球史并不完全等同,从研究对象上看,“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9]。从研究范围和研究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跨国史研究的是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跨国现象,而全球史研究的是跨地区和跨大洲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史的题材范围要比跨国史小得多”^[9];同时,与跨国史研究强调基于原始档案材料不同,“大多数全球史研究主要依赖二手著作”^[9];徐国琦认为,跨国史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史不同在于,跨国史偏重指研究的方法而非范围。在研究对象上,“‘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跨国史研究的突破口”;在研究材料的选取上,跨国史“强调多国档案研究”。^[10]在他看来,“跨国史的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其特点也是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10]

根据国内外史学界对于跨国史及其相关概念的已有介绍和论述,可以看出,跨国史和国际史、全球史并不完全等同。国际史仅仅关注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处境;跨国史则在承认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强调运用多国档案材料,研究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现象,并试图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法和视角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二、跨国史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实践

跨国史研究最早在美国历史学家的推动下从理

念走向实践,入江昭、伊恩·蒂勒尔和托马斯·本德这些跨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进行了最初的主题和实践尝试。他们关于跨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跨国史范式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新书写。作为主要研究美国城市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学者,托马斯·本德积极主张将美国历史置于跨国的或全球的更广阔联系中来理解。2001年他出版了著作《在全球化时代反思美国史》,在书中他写道:“人们意识到了国家内部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这种新意识不可避免地正在改变当代的历史编纂。这些情况促使甚至要求人们从一种视角重新思考美国史,这种视角不再受制于把国家当作美国史容器的观念。人们不再相信国家是闭关自守、独立自主和内部没有差别的。我们也不能理所当然地把国家当作自然的或独一无二的历史分析单位。”^[11]这本书的出版可谓吹响了美国史重新书写的号角。接着,2006年他正式推出美国史重新书写方面的代表作——《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本书第一次将美国历史置于宏大的全球史背景下,运用跨国史的视角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他选取和检视了美国历史叙事中的五大重要主题(即“海洋世界与美国史的开端”“‘大战’与美国革命”“国家构建时代中的自由”“帝国中的帝国”“工业化的世界与自由主义的转型”)并将其视作全球史的一部分并用跨国的视角来重新加以解释。在该书的导言中他重申了自己的跨国史观,并强调了对美国史采用这种新的史学范式进行研究的意义。他说:“我们所需要的史学是一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史理解为自身不断构成了多重历史,同时又被多重历史所塑造的史学。而多重历史(的范畴)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民族国家史(的范畴)。民族国家并非决然独立、封闭自足的;它跟其他各种人类团结(的形式)一样,不仅与外部相关联,也或多或少地被自身之外的环境所塑造。”^[12]王立新认为,“该书提供了关于美国历史的新叙事,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5]此外,其他的历史学家也出版了相类似的作品,像伊恩·蒂勒尔先后于2007年和2010年出版的《跨国之国:全球视野下1789年以来的美国史》和《改造世界:美国道德帝国的创立》两本著作便是如此。

二是基于跨国史视角对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宗教机构等跨国组织和文化、移民、环境等跨国现象两大类)的关注和考察。

入江昭是运用跨国史研究这一主题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从20世纪末开始,他就对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展开了研究,在史学界又开风气之先。他的著作《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一书就是其运用跨国史研究国际组织的最新成果。书中对19世纪后期以来的“人道主义救助”“文化交流”“和平与裁军”“发展援助”“人权”及“环境保护”这六个方面的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追溯和回顾,以此探讨国际组织的活动在组织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调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他说:“以国际组织、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为分析单位,这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也使我们得以重新阐释世界现代史。”^[13]入江昭的另一本著作《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一书则特别考察了“文化”这一跨国现象的发展历程,认为文化国际主义是促进国家间交流、理解以及合作的最好途径,有助于良好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在书的序言里他这样写道:“文化国际主义通过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过学术合作,或者通过促进各国间相互理解的努力,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同各种各样的活动联系起来。”^[14]入江昭后来回忆说,“我现在有些后悔当初没以《文化跨国主义与国际秩序》为题命名此书,这样可以更好地描述文化交流中体现出的跨国主义和国际主义。”^[15]可见,他极力主张用跨国和国际的视角取代国家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在另一部著作里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在全球联结发展得如火如荼、跨国意识不断高涨的时候,支持国家中心主义与排他主义无异于在开历史的倒车。”^[15]这也足见其在非国家行为体的考察中对跨国史视角运用的青睐。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史的研究主题和实践一方面聚焦于民族国家史的重新书写,将民族国家放置于更宏大的全球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深化了对原有的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视域范围,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关切和考察范围,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将“国史”延伸为“人类史”。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倡导跨国史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不重要,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王立新所言:“跨国史是对国家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代替。优秀的历史写作是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和跨国史视角之间保持分析和叙述的平衡。”^[5]

三、跨国史与教育史研究

作为当今史学界的新转向,跨国史打破“民族—国家”范式对历史研究与书写的束缚,这一史学新转向已经对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编撰、书写和教学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堪称一场“史学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史的观念和方法被陆续介绍到我国,特别是跨国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国内史学界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一批中国历史学者努力介绍并开始运用跨国史进行历史研究,如:王立新的《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国史的兴起》(2014)、《跨国史的兴起和20世界史的重新书写》(2016),徐国琦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2014)、《亚洲与大战:一部共有的历史》(2016)等。另一方面,跨国史的研究机构也陆续在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出现,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2016年,山东大学成立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可以说,跨国史研究已渗透到传统的中国史、世界史研究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者开始从互动视角探讨中国历史中有关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并试图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

作为教育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同时也是历史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的教育史,史学界的这种跨国史研究趋向必然对教育史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当今这个民族国家之间互动十分频繁的世界,理解跨国史并加以运用,对教育史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也兼具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可以从教育史的价值追求、历史观、书写和编撰等方面来思考跨国史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首先,跨国史的出现让我们重新审视教育史的价值追求。我们可以运用跨国史视角,将历史看作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关联共同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社会已然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跨国史的价值取向让我们更多地关注那些涉及整个人类共同体而非某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与现象。因为跨国史的考察超越了国界,它探究跨国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70周年之际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公共利益”理念转变?》的教育报告里提出了新的教育价值定位,即“教育是全人类的共同核心利益,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6]可以

说这种对教育价值的新的定位也正昭示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教育史的价值追求?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我们是否可以和国际教育史学者共同合作,利用多国档案,跨国研究人类教育的一些共同主题,以此一方面弥补民族国家史的不足,更全面深入认识和书写我国的教育历史;另一方面在深入认识我国教育历史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更高的人类命运的共同教育历史,让教育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核心利益。通过教育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等的普遍尊重,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教育服务世界和平的宗旨。

其次,跨国史的出现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我们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类教育的独特、互动而又共存的视角出发研究教育史,并将教育史理解为人类互动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也就是将民族国家的历史与跨国史结合起来看待,从而弥补民族国家史在跨国、跨区域研究主题上的不足和空白。因为跨国史并不意味着要抛弃民族国家的历史,跨国史仅构成对既有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模式的一个补充。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跨国史重拾那些民族国家书写中心之外的被遗忘的教育历史事实,丰富我们的教育史研究的主题,如:加强有别于传统的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外的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心态史等主题的研究。改变当下教育史主题研究的同质化现象,“特别是教育史人物研究的千篇一律,教育家思想不断重复,教育史人物缺乏个性。”^[17]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跨国史重新研究跨国、跨区域的教育历史主题,如:留学教育、教会教育等。以留学教育为例,当下的教育史研究主要关注留学生在出国前所做的努力和归国后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知识的形成过程的具体揭示。跨国史的历史视角弥补当下教育史研究在这些研究主题方面的不足。

最后,跨国史的出现为教育史的完整书写和编撰带来了启发。在教育史书写方面,跨国史研究意味着将整个教育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非看作分裂的各个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世界教育史并不是简单的在民族国家教育史基础上的拼凑,因为这样的世界教育史将有可能遗漏很多对国家教育发展产生影响的具有跨国属性的但又无法列入国家教育史书写内容的教育事实。这样的世界教育史将是不完整的。换句话说,

一部完整的教育历史应该将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和跨国叙述结合起来书写,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只相当于书写了一半的教育史。同样以留学教育为例,在教育史教材书写中,留学归来的教育家都是文科背景,理科教育家被无故“缺位”。正如储朝晖所言,“在讲到教育家的时候,很少提及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饶毓泰这些在数理教育上功绩卓著的教育家。”^[18]另外,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史研究者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某几个留学生的身上,而对于留学生群体缺乏整体的研究。专研中国人留学美国史的杨钊发现,“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留美学生的热门选项,两校对中国留学生的思想也有着相当不同的塑造。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相当一部分受到杜威的影响。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不少人奉白璧德这一新人文主义学派代表为宗师”^[19]。而当下很奇怪的现象是教育史研究中只关注诸如陶行知、陈鹤琴、蒋梦麟、胡适等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却鲜有关于林语堂、陈寅恪、吴宓、梅光迪、汤用彤和梁实秋等留学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研究。我们需要运用跨国史的研究范式书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留学史,在恢复其全貌的同时,赋予其重要的全球性维度。在教育史编撰方面,跨国史将给我们提供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线性史观下的历史分期。随着更多的教育历史主题被发掘和原有的跨国、跨区域的教育历史主题被更深入的解读,教育史分期是否有可能跳出教育理念引领教育实践、将新的教育理念的出现作为教育史分期的依据这样的固有解释传统,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当然,我们在借鉴运用跨国史研究视角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教育史研究的边界,不能无原则地臆造关联性,从而造成对教育历史的误读。我们只是借鉴跨国史的某些合理内核,以期对教育历史有全面深入地把握。正如夏继果所说:“人类历史是纷繁复杂的,其中既有个体社会的发展,也存在跨越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大规模进程。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模式都不足以揭示历史的全貌,只有多维度地研究历史,才能更加全面地、立体化地揭示历史发展进程。”^[20]

参考文献:

- [1] 入江昭. 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M]. 邢承吉,滕凯炜,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2] 吴忠超.《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新思考[J].历史教学问题,2000(2):41-43.
- [3] 景德祥.黑格尔与兰克历史认识论之辩[J].江海学刊,2018(4):160-169.
- [4] 黄进兴.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54-67.
- [5] 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国史的兴起[J].历史研究,2014(1):144-160.
- [6]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9,94(1):2-4.
- [7] AKIRA IRIYE. Transnational History[J].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2004,13(2):211-222.
- [8] 刘文明.跨国史:概念、方法和研究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8(8):57-63.
- [9] 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J].世界历史,2016(2):4-24.
- [10] 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J].史学月刊,2017(7):20-23.
- [11] THOMAS BENDER.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3.
- [12]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M].孙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2.
- [13] 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M].邢承吉,刘青,颜子龙,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
- [14] 伊里耶,段丽萍.《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序言[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9):6-9.
- [15] 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M].王勇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220.
- [16] 顾明远.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N].光明日报,2016-01-05.
- [17] 于述胜.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C]//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教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2009:123-124.
- [18] 储朝晖.关于重写中国教育史的断想——从理科教育史缺位谈起[J].中国教育科学,2019(2):121-129.
- [19] 寇淮禹.林语堂没拿到博士学位?留学史视野下的林语堂[N].新京报,2019-05-06.
- [20] 周晓菲.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N].光明日报,2017-02-13.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LI HUI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ith the criticism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nation-state” historiography, which began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movement of American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has gradually risen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Akira Iriye, Ian Tyrrell and Thomas Bender,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made initial themes and practical attempts. Their research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mainly focuses o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re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states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other is the att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non-state bod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has many meanings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first, it let us re-examine the value pursuit of educational history; second, it provides a new view of histor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hird, it brings inspiration to the complete writing and compilation of educational history. We can use the paradigm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history; “nation-state” research paradigm;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责任编辑 张斌贤)